

# 「風險社會」與現代化

◎ 劉小楓

70年代以來，「後現代論」帶有強烈的或鬱憂或激越的現代性危機意識，它同時亦在擴散一種審美的現代的論點。

70年代以來，歐美文化知識界又起危機之聲<sup>①</sup>。一百年前的西歐知識界狀況如何呢？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尼采對現代性的或鬱憂或激越的批判，擴散了市民階層的危機意識，開設了一條審美化的現代主義言路，隨之，出現了社會理論的新的建構努力：涂爾幹(Emile Durkheim)、西美爾(Georg Simmel)、韋伯致力從社會知識學的立場對現代社會的危機意識作出反應。尼采的審美化的社會批判意識對西美爾和韋伯的學術都是一個內在的動因<sup>②</sup>。

本文將要審理的當代德國社會理論界的「風險社會論」(Theorie der Risikogesellschaft)的形成，與西美爾、韋伯的社會理論之形成有相近的知識社會學的語境：70年代以來，「後現代論」首先在哲學、文化學和文藝思想語域中出現，帶有強烈的或鬱憂或激越的現代性危機意識，它同時亦在擴散一種審美的

現代(die ästhetische Moderne)的論點<sup>③</sup>。「後現代論」話語的社會實在論的基礎是70年代西歐社會形態的結構性危機，這場危機使「現代化理論」喪失了信譽。但是，社會理論界依然拒絕對現代性危機作審美主義式的反應(如阿多爾諾的反應)<sup>④</sup>。80年代中、後期，由貝克(Ulrich Beck)、伯格爾(J. Berger)和沃弗(Claus Offe)等提出並發展的「反省的現代化」理論，調整知識學立場，重新審理「現代性危機」的社會知識學。

百年來，現代性的危機意識從未鬆弛過，以致「危機」論在思想學術域已成了顯論或常態。但是，對現代性危機的反應一直有兩條不同的知識學方式<sup>⑤</sup>。貝克的「風險社會論」承繼的是韋伯和盧曼(Niklas Luhmann)、哈貝馬斯的社會思想路線，即拒絕非理性的浪漫式的知識反應。貝克提出的「第二階段的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 zweiter

Stufe)論點與當年韋伯在尼采思想的語境中展開的「合理化」社會理論建構，有一種連音符式的關係⑥。它涉及社會理論的知識學預設、現代社會之品質分析、現代性危機之理解等諸多現代學的基層問題，近年來的文獻表明，貝克經營的「風險社會論」對社會學、政治學、哲學、法學、倫理學以及社會輿論界均發生了影響，在人文—社會科學中擴散，產生了範式轉換(Paradigmawechsel)的社會理論效力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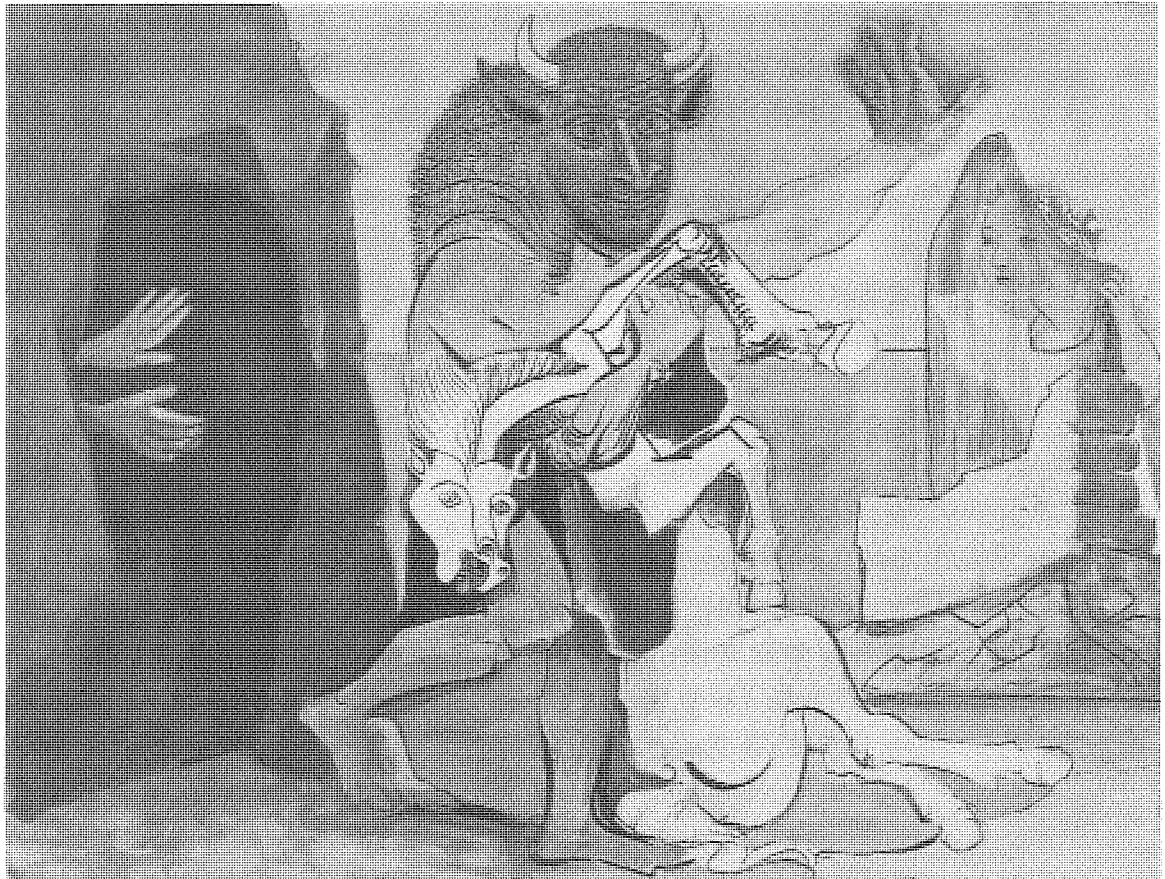
「風險社會論」被描述為一種歷史的反省現代化理論，與「現代的危機」問題緊密相關。在堅持推進「現代構想」的立場上，貝克與哈貝馬斯保持一致，但在社會理論的具

體建構上，兩者處於論爭狀態。貝克不僅反省當今的現代狀況及其危機症候，而且反省作為反省現代現象之知識學工具的社會理論的基架，因而帶有社會思想的範式反省性質，以便適應現代狀況中的新危機症候。本文將扼要考察貝克的「風險社會論」。我將着重關注三個要點：一、貝克的現代化理解，二、貝克對「風險」概念的重構，三、社會理論對「風險社會」反應機制的重構。

貝克經營的「風險社會論」在人文—社會科學中擴散，產生了範式轉換的社會理論效力。

在提交給「德國社會學協會」第二十五屆大會(1990)的論文「兩種

在當代社會理論中，「風險」概念逐漸被廣泛採用。



現代的衝突」中，貝克力圖推進他於1986年提出的論點：現代現象中出現了斷裂，古典的工業社會的現代性草案被否決，一種新的現代形態出現了，這種形態可稱之為工業化的「風險社會」⑧。

在十九世紀，現代化解散了已不斷肢解的農業社會，揭開了工業社會的結構圖景；與此相似，當今的現代化勾銷了工業社會的種種草圖，在現代現象的連續性中，出現了另一種社會形態。

根據這一觀察，貝克引伸出兩種「現代化」的論點：即「區分簡單的和反省的現代化。簡單的現代化指傳統的理性化，反省的現代化指理性化的理性化(Rationalisierung der Rationalisierung)」⑨。貝克的論點之知識社會學語境是「後現代論」：在「後現代論」的話語中，既有的理念和社會特徵正在全面消失：「後工業社會」、「後啟蒙」等概念表達的是一種冥暗意識，顯明時代精神喪失理解力，陷入束手無策的困境⑩。然而，社會思想的責任當是知性地把握現代性的危機，而非沉湎於文人式的尖叫、挖苦或反諷。社會思想必須進入反省的理論狀態。從社會實在層面看，反省的現代化訴求是由近三十年來社會機體的轉型促動的：工業社會的經濟、政治、科學之系統關聯已溶解為生活世界的經驗關聯(Erfahrungszusammenhang)，人們已從工業化的穩定狀態和標準生活形式中游離出來：現代社會在建制

分化中已然碎裂，生活實在的裂散仍在擴展：凡此種種導致一個雙重性的麻煩：一方面，人們因社會的穩定網絡的正常化而日益感到生活的實在，另一方面，生活世界的制度性基礎以及許可形式(Konsensform)卻發生了動搖⑪。社會理論必須探究，這種情形是如何發生的，對於現代性，社會形態的變化究竟意味着甚麼？

但是，社會理論的知識狀況在妨礙對現代性的理解。這首先是指，早期現代化理論的基本論點成問題：早期現代化理論把戰後西方工業資本主義視為社會演進的普遍有效的目的。然而，「現代」恰恰不能等同於資本主義工業社會。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基本構想是在十九世紀形成的，工業社會的實際達成，不等於現代化的達成。當今社會所面臨的不僅是十九世紀的終結，而且是現代與工業社會的明顯對立。更直截地講，工業社會只是現代化的半途而廢。以為工業社會(其工作和生活樣式、生產部門及其評價尺度如經濟增長、科學技術觀、民主形式)才是地道的現代社會，而且是現代化的頂峰，完全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迷思⑫。貝克甚至主張，工業社會只是埋藏在現代現象中的一個反現代的形態，因為，它並沒有克服自身的前現代的封建殘餘(vormoderne und feudale Reste)。至少可以說，工業社會過去和現在都不是單純的工業社會，它有一半仍是身分社會(halb Ständegesellschaft)，其中的身分等級制方面儘管不是傳統的殘餘，而是作為工業社會的產物和基礎，

以為工業社會才是地道的現代社會，而且是現代化的頂峰，完全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迷思。貝克甚至指出，工業社會只是埋藏在現代現象中的一個反現代的形態。

鑲嵌在工作和生活的制度性圖式中<sup>⑬</sup>。這表明，社會不平等和層級制(Hierarchien)在工業社會中並未得到制服。

貝克將現代與工業社會劃清界線的論點，是由他的「現代」理解來支撐的：現代只是一個社會轉變過程本身的標識，而不是一個社會轉變所要達到的目標。因此，現代化也就不是指社會向那個「現代」之境邁進的轉變，而是指一個社會的轉變之始終開放着的過程本身。今天被視為「現代」、「摩登」的社會狀況，明天就已經成了傳統，必須再使之現代化，脫離這個傳統。與現代概念相對的「傳統」，按此理解，也就不是指某種確定的歷史之階段的社會內涵，而是指歷史地產生出來的社會痂皮(Verkrustungen)，現代化過程因此是在不斷地革除社會痂皮又不斷地在制造社會痂皮。

現代性和傳統性因此不再是可截然劃分開的二元因素，它們交織在同一個社會形成的過程之中了。這樣的論點表明，貝克的「現代」定義可等同於一個無定形的社會轉變(sozialer Wandel)過程<sup>⑭</sup>。

貝克的「現代」理解，攻擊早期現代化理論的「現代」理解中的目的論和進步論成分，但並沒有否棄現代化過程本身及其社會學的訴求。在貝克那裏，現代化理論的演進論只是被改造了：現代化是動態與靜態、現代性與傳統性的一個純時間(歷史性)的過程化張力結構，這種張力是在現代現象之中構成的。這引伸出如下論點：儘管現代化是一個沒有確定目的點的歷史行動過程，它依然必須針對一切社會痂皮<sup>⑮</sup>。倘若把現代固定為工業社會的建構，那麼，工業社會就是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社會痂皮，於是，

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出現，並不等於現代化的完成。



工業化的現代就需要現代化。這就是現代的現代化的涵義。

## 二

工業化現代的現代化實際意味着拒絕把現代定位於工業化社會，因為，現代化的進程已進入「風險社會」狀態：如果說，工業化階層社會的中心位置設定在生產和財富的分配上，那麼，「風險社會」則是由生產、界定(Definition)和現代化危機的分配建構起來的。看來，工業社會與風險社會的差異首先是由財富分配與風險分配(Risikoverteilung)的差異來區分的，儘管這兩種分配邏輯在當前社會狀況中，仍有交叉或重疊的情形。貝克堅持認為，財富分配與風險分配是兩種結構不同的社會不平等的範式，在現代化過程中，兩種範式有確定的、時間上的承續關係。

何謂「風險」？「風險」概念原是早期資本主義時期商貿航行的一個術語<sup>⑭</sup>。隨後逐漸成為商業行為和金融投資中的一個日常性概念，意指某項旨在贏利的行為可能承擔的利害風險，這種風險是可以通過計算量化的。70年代後期，化工廠和核能工業的污染如外洩事件，使社會科學家們開始關注技術和社會發展的災難性後果。至此，「風險」概念的用法擴大，意涵現代技術工業的災難潛能。隨着生態危機問題熱化，「風險」概念自80年代以來已從一個單純技術—經濟的範疇擴展為一個社會理論的範疇，並在社會

科學的討論文獻中逐漸被廣泛採用<sup>⑮</sup>。然而，「風險」概念同時亦被意識形態化了，這是指「風險」概念被用於為技術工業行為擴張的正當性辯護：一切造福的工業擴展(如核能開發)都帶有正常的風險度。

拉夏德(Lagadec)在1981年已用「風險社會」的概念指稱當今社會形態的性質，但他的用法尚帶有飄浮性。在貝克的用法中，「風險社會」概念已建構成一個歷史的系統範疇：不僅從社會機體論的角度，而且從社會結構論的角度乃至歷史哲學的角度來看待風險潛能。首先，貝克突破了社會知識界對「風險」概念的技術—經濟學的理解，即跨越出自然科學—技術學的角度來界定社會—政治的風險潛能，不是以自然科學—技術學的數據標準來評定風險度，而是使「風險」概念成為一個社會學的關鍵概念，促使社會知識之理性意識到前科學和非科學性的危機——往往是無法量化的危機：隨之，「風險社會」概念不再是一個指述性的概念，貝克力圖使之成為現代現象的歷史—系統的結構模式。因此，在貝克的用法中，「風險社會」就不是簡單地在把生態危機變成一個社會學的主題。貝克突顯「風險」概念的批判性，旨在突破自然科學—技術學的危機界定的單面性，把社會—政治的危機推到前景，打破自然科學家在風險界定上的「理性壟斷」(das Rationalitätsmonopol)，彌合文明危機處境中科學理性與社會理性之間的鴻溝<sup>⑯</sup>。

技術學上的風險計算，對生態危機的社會意識和社會的危機意識

「風險」概念自80年代以來已在社會科學的討論文獻中逐漸被廣泛採用。然而，它同時亦被意識形態化了，這是指「風險」概念被用於為技術工業行為擴張的正當性辯護：一切造福的工業擴展(如核能開發)都帶有正常的風險度。

本身，這三者是有差異的，不可比較，更不可劃一。貝克重視生態危機問題，但他的思想焦點在社會機體和社會結構的危機意識本身。這意味着，歐美發達工業社會的危機絕非只是理念性的或藝術價值方面的，而是社會實在性的<sup>⑩</sup>。

風險社會指示的是工業主義的一個日益不可把握的階段，這個階段更為現代，並且被懷疑受籠罩，因為它處於人為製造的自我毀滅的可能之陰影中，提出了自我限制的主題。這才是風險社會概念的新意，它與所有相互角逐的社會概念形成對照。風險社會概念促使社會學——乃至社會！——對生態學問題的投入。風險和危機表明的一種新的社會衝突動力，社會學必須把握這種衝突並把政治方面包括在內。表面上硬性的自然科學的症候有迷惑力，它掩蓋了政治的力量領域，正是在政治領域，對不斷增長的毀滅和危機的無知和半通不通才得到清理。……風險社會是進入我們置身其中的社會的無人之地(Niemandsland)的鑰匙，主流的過去概念掩蓋了這片無人之地，閉上了進入它的大門。應該說，舊的政治大集團的範疇已裂散，不再能把握現代社會的政治動力，因為，個人化發生在一個已失去緩衝的全面移動的社會。隨着傳統的穩定性的滑動以及從正當性的危機來看，個體已有了新的含義。所有的社會學都(或多或少)在推導個人。個人幾乎成了社會學的假概念。也許在未來我們不得不強烈地詢問：如何去思考作為積聚、作為有意識地或自

利地試驗自己的生活的個體之結果的社會。這一切並非如許多人所認為的那樣是後現代的表達。我們仍生活在現代，也許還是更為現代之中，只不過我們迄今用來描述現代的那些社會範疇，已不再能把握現代而已。

這段話清楚地表明了貝克建構「風險社會」概念的多層面的意向：生態問題、社會機體(政治)問題、社會學範式問題以及現代社會之品質危機問題。「風險社會」的概念之關鍵仍在於社會層面的問題：「一個普遍性的陰影現代(Schattenmoderne)，即工業化的世界後果社會，搗毀了舊的工業社會的生活秩序。」<sup>⑪</sup>換言之，社會的形態本身已變得超出了既存的所有社會學的把握能力。西美爾在工業化社會的初期提出的問題：社會是如何構成、如何可能的，在貝克那裏重新出現：社會作為個人的社會化運動如何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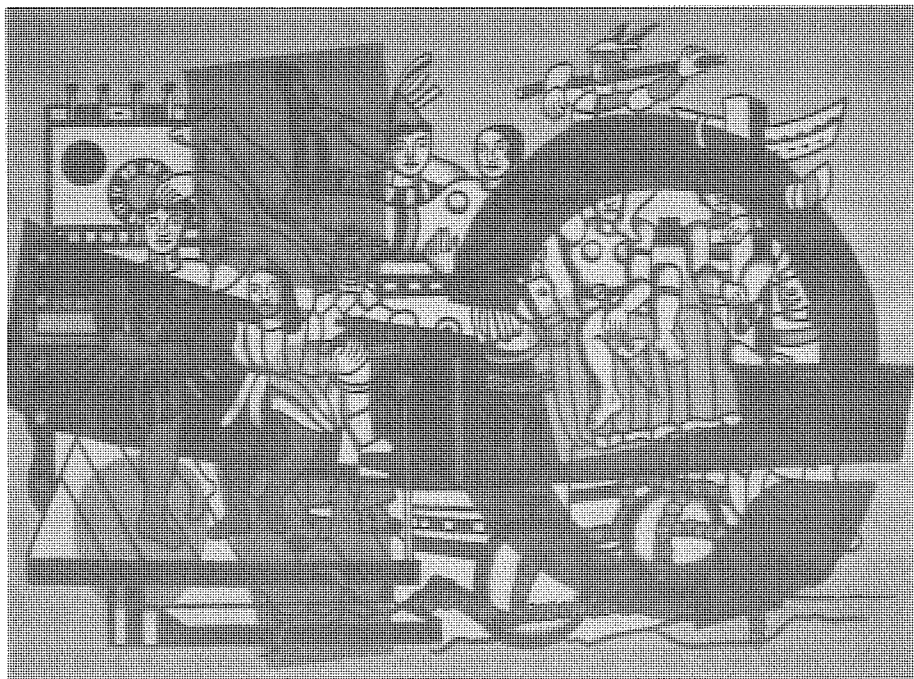
### 三

針對現代化的現代狀況——風險社會，貝克提出「反省的現代化」論。「反省」作為一項社會學的訴求究竟是甚麼意思呢？

「反省」首先是指：正視或檢省工業化現代的危機和後繼問題(Folgeproblemen)，並通過檢省建構一種社會現代化的更新理論。由於現代化已被傳統社會學理解為傳統的理性化(韋伯—帕森斯—哈貝馬斯)，反省的現代化指向的就是

貝克突顯「風險」概念的批判性，旨在突破自然科學—技術學的危機界定的單面性，把社會—政治的危機推到前景，打破自然科學家在風險界定上的「理性壟斷」，彌合文明危機處境中科學理性與社會理性之間的鴻溝。

貝克將「現代」理解為只是一個社會轉變過程本身的標識，而不是一個社會轉變所要達到的目標。因此，現代化也就不是指社會向那個「現代」之境邁進的轉變，而是指一個社會的轉變之始終開放着的過程本身。



一種現代理性化的批判社會理論的建構，即批判「現代構想」迄今僅只在中途的、殘破的實現<sup>①</sup>。

貝克最初提出「反省的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sierung)是在80年代初，當時的語境是批判社會科學運用研究的「科學中心論」和社會學的實踐關涉的自我反省，因此，這一構想還帶有知識社會學考慮的限制<sup>②</sup>。當時，貝克採納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來看待作為現代化後繼問題的生態危機趨向<sup>③</sup>。但是，貝克在論證「反省的現代化」時，已涉及日益危機化的現代的歷史的自我關涉，並提出社會學思想範式的重構問題：應從科技文明特定階段下的科學與公共領域的關係，來把握社會學的實踐關聯。當前的特定階段的特徵是：科學化(Verwissenschaftlichung)日益與一種已然科學化的實踐相關，因此，重設科學化在實踐中的位置的條件、衝突和

問題都發生了改變<sup>④</sup>。貝克由此引導出兩種科學化的區分：初級的或傳統的科學化與進級的或反省的科學化。前者指把科學簡單地運用於改塑傳統世界的人、自然和社會。當今，這種科學化已走到盡頭，危機已經出現，科學必須轉過來對付自己：對付自己的產物、錯誤和自造的麻煩<sup>⑤</sup>。

科學化與現代化在某種意義上是涵義相同的：由於貝克從社會的制度性機制來看待現代化，科學在現代社會中的擴張被視為最重要的制度化因素。貝克希望通過對科學的制度化懷疑和制度性批判來改變科學的原則和建制。這同樣適用於反省的現代化：通過批判和懷疑制度化(合理化)的現代，改塑現代性的原則和建制(合理化的合理化)<sup>⑥</sup>：

對「科學進步範式」的批判表達了對

「現代性危機」的深層把握，這自然不是終結現代化，而是標識出社會現代化的新階段。我們關注的是，從「樸素」的現代化向「反省」的現代化的過渡必須明朗，即把現代化運用於現代化本身……現代化自身要現代化，這是一個過程，它包括對科學的把握，因此就必須討論從初級科學化向進級科學化的過渡。

這裏使用的「科學化」一詞不僅指自然科學，也包括隨現代化過程而不斷擴展的社會科學，因此，科學化與現代社會的制度結構聯在一起，反省的現代化尤其指向現代社會的制度因素，檢省促動現代化進程的政治—道德的諸建構的問題性。因此，與哈貝馬斯不同，反省的現代化瞄準的就不是定位於交往生活世界的理性化概念，而是進一步的功能分化和社會的脫離傳統(Enttraditionalisierung)：分化及其取向意義是要從傳承的生活秩序中解放出來。未完成的現代構想之完成，依賴的不是實現內在的理性潛能，而是對現代構想的反省。只有當現代化轉向了自身(現代的現代化)，才有可能設定現代化的政治和道德直覺得以兌現的建制性結構。這表明，反省的現代化論對社會現代化的界定與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的理性化」理論相左，而與盧曼的系統—演進論相近。

反省的現代化的機遇不能附於既有的現代之合理性，機遇只在於不斷擴張選擇，而不斷擴張選擇，才是真正現代性的品質。克服現代性危機(Krise der Modernität)的潛

能因此就在於使現代化的結構建構本身現代化。

#### 四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多爾諾(Theodor Adorno)的社會批判理論曾把現代性的內核界定為「新異與老一套的辯證法」(Dialektik des Neuen und Immergleichen)，並由此展開審美化的意識形態的批判<sup>27</sup>。反省的現代化論似乎採取了與此相一致的攻擊性立場，貝克指責現代化已轉變為野蠻<sup>28</sup>。但實際上，兩者有根本上的不同：反省的現代化論並不糾纏於資本主義統治關係中的啟蒙問題，它關心的只是：現代化尚在半途，而且可能報廢，這才是現代的現代性危機。貝克把現代的僵硬化等同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早期工業社會的結構，因此把現代與工業社會對峙起來。這樣，被阿多爾諾視為現代社會之進程邏輯的「新異與老一套」交替，就被貝克重釋為現代化進程的兩個歷史性的相續關係。貝克的設論點是：走向另一種現代之可能性。

反省的現代化也訴諸於社會主體意識，這首先是指克服現代的宿命論，似乎現代化只有一條路走到黑。「沒有對抗意志、對抗有計劃的行為、對抗專業化巨輪的意識，現代化就會埋葬現代化」<sup>29</sup>。貝克要求社會理論干預整個社會行動領域，促使其自我否定、自我革命和自我政治化。

本文篇幅不能細緻評析反省現

反省的現代化論並不糾纏於資本主義統治關係中的啟蒙問題，它關心的只是：現代化尚在半途，而且可能報廢，這才是現代的現代性危機。



代化論的理論細節，如生態危機處境的社會制度性基礎及日常性分配，財富分配衝突的制度化、國際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依賴關係、國際關係不平等與生態破壞的關係、社會理論向知識社會學的還原、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的危機現象、家庭結構的徹底解體（貝克所謂多家之家 Familien）以及社會建制與社會變遷不相適等問題。

問題僅在於，現代化社會的現代狀況在不斷向社會知識學界拋出新的麻煩，種種危機發現和危機呼籲幾乎已經使知識界和公共論壇習以為常。危機已經成了常態。在這樣的社會處境中，反省的現代化論力圖使社會理論切近實際的社會裂痕，並同時檢審社會理論的知識學庫藏。它表明從社會現實出發重構社會理論的訴求。因此可以說，所有過去的經典社會理論的框架，都被現代的變相經驗置於反省的現代化的瞄準範圍。當然，反省現代化論本身也不例外。

### 註釋

① P. Kondylis: *Der Niedergang der bürgerlichen Denk- und Lebensform—Die liberale Moderne und die massendemokratische Postmoderne*（《市民思想和生活形式的崩潰：自由的現代與群眾民主的後現代》）（Weinheim, 1991），頁167以下。

② O. Rammstedt 編：*Simmel und die frühen Soziologen*（《西美爾與早期社會學家》）（Frankfurt/Main, 1988）一書中O. Frisby, H.-J. Dahme和O. Rammstedt等的論文。

③ A. Kilb: 〈寓意的幻想：論後現代的審美〉，見 C.P. Burger: *Postmoderne: Alltag, Allegorie und Avantgarde*（《後現代：日常、寓意和先鋒派》）（Frankfurt/Main, 1992），頁85以下。

④ 「對新的崇拜及其現代的理念，由於再也沒有新而遭到造反」。Th. W. Adorno: *Minima Moralia*（《最低限度的道德》）（Frankfurt/Main, 1975），頁316。阿多爾諾與羅蒂、李歐塔、福柯的思想關聯，參H. Brunkhorst: *T.W. Adorno: Dialektik der Moderne*（《阿多爾諾：現代的辯證法》）（München, 1990），頁146以下。

⑤ P. Wehling: *Die Moderne als Sozialmythos—Zur Kritik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Modernisierungstheorien*（《現代作為社會迷思：社會科學的現代化理論之批判》）（Frankfurt/Main, 1992），頁59以下。

⑥⑧⑩⑫⑬⑭⑮⑯ 由於意識形態批判對時代精神的危機採取了冷嘲挖苦式的拒絕態度，貝克以為，意識形態批判就是在喪失距離地加強危機，這種態度因此是危險的。貝克的問題是，如何從社會學思想來理解、把握時代精神的危機。貝克明確提出抵制十九世紀式的「時代精神的非理性」衝擊。參U. Beck: *Risikogesellschaft*（《風險社會》）（Frankfurt/Main, 1986），頁13；14；12；15；136、179；25；25以下；38以上。

⑰ 1990年舉行的「德國社會學協會」第二十五屆大會，研討主題是「現代社會的現代化」。貝克在開幕式上作了題為〈兩種現代的衝突〉的報告。大會的研討主題表明，貝克等經營的「反省的現代化理論」在德語社會理論界佔取了論域位置和論題主權。

W. Zapf受德國社會學協會之託，將研討會論文編輯成書，達810頁，除六篇主題報告外，其餘論文分別按十次大會研討主題編排，這十項主題可大致反映德語社

會學界近十年的學術關注：一、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二、生產、工作分工、工作社會；三、西歐的整合或解散；四、階層社會、父權制、個人化；五、現代化、反現代化及其男女擔當者；六、現代化的政策、調節的限度；七、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改變；八、自然控制、技術和社會；九、生活進程和生活形式的轉變；十、社會學知識與社會學的分歧。參W. Zapf編：《Die Modernisierung moderner Gesellschaft》（《現代社會的現代化》）（Frankfurt/Main, 1991）。

貝克論點的擴散，亦可見U. Beck, O. Lafontaine: *Politik der Risikogesellschaft*（《風險社會中的政策》）（Frankfurt/Main, 1991）。

⑨⑩⑪ U. Beck: 〈兩種現代的衝突〉，見U. Beck, O. Lafontaine: 《風險社會中的政策》，同前，頁180；182；188。關於現代理論的中文文獻，參羅榮渠編：《現代：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1993）。

⑫ A. Evers, H. Nowotny: *Über den Umgang mit Unsicherheit*（《論與風險的交往》）（Frankfurt/Main, 1987），頁34以下。西美爾最早從社會學方面討論「風險」概念，參G. Simmel: *Philosophie des Geldes*（《貨幣哲學》）（Frankfurt, 1989），頁341以下。

⑬ L. Hellmann, R. Schafer: "Zur Rolle von Risikobetrachtungen bei der Durchsetzung der Kernenergie"（《核能利用中風險觀測的作用》），見Scheidewege卷九（1979），頁523以下。Perrow甚至認為，「風險」概念的意識形態功能實際關乎的不再是技術「風險」，而是權力，即有權力為了一些人的較少的利益要其他人擔負巨大的風險。參Ch. Perrow: *Normale Katastrophen*（《正常的災難》）（New York, 1984；Frankfurt/Main, 1987），頁357。可比較哈貝馬斯審理的「危機」概念參哈貝馬斯：《合法性危機》，陳學明譯（台北，1994），頁4以下及頁

37以下。

⑭ U. Beck: 〈風險社會及其對策〉，見U. Beck, O. Lafontaine: 《風險社會中的政策》，同前，頁98-99。

⑮⑯⑰ U. Beck: *Gegengifte. Die organisierten Unverantwortlichkeit*（《抗毒藥：機體化的不負責》）（Frankfurt/Main, 1985），頁292；16；160。

⑱⑲⑳ U. Beck: 〈現代化的後繼問題及社會學在實踐中的位置〉，見U. Beck編：《Soziologie und Praxis》（《社會學與實踐》）（Göttingen, 1982），頁9；11。

㉑ 盧曼關注生態危機顯露出的現代化原則的基礎，並且以功能的系統分化(System-Differenzierung)來解釋危機趨向。按照盧曼的思路，克服危機的可能性在於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在個別的功能系統中，如何可能增強反省，反省的目的在於使功能的轉移相對化，以便控制無抑制的增張衝動。參N. Luhmann: 〈社會結構的條件和自然科學——技術進展的後繼問題〉，見R. Low等編：《Fortschritt ohne Maß?》（《沒有尺度的進步？》）（München, 1981），頁125。

㉒ U. Beck, W. Bonss: *Soziologie und Modernisierung*（《社會學與現代化》），見U. Beck主編：《社會世界》雜誌，35卷（1984），頁385。

80年代後期以來，發展「反省的現代化」論點的還有J. Berger和C. Offe。參J. Berger編：《Gibt es ein nachmodernes Gesellschaftsstadium?》（《有一個後現代的社會階段嗎？》）；C. Offe: 〈零度選擇的烏托邦〉，見J. Berger編：《Die Moderne—Kontinuitäten und Zäsuren》（《現代：連續與間隙》）（Göttingen 1986）。

㉓ 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老一套的新異，是藝術家的審美現代性造反的對象。參Th. W. Adorno: *Ästhetische Theorie*（《審美理論》）（Frankfurt/Main, 1970），頁39。